



船政史



Chuan Zheng Shi

陈悦 著

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

非整理水师不可

欲整理水师

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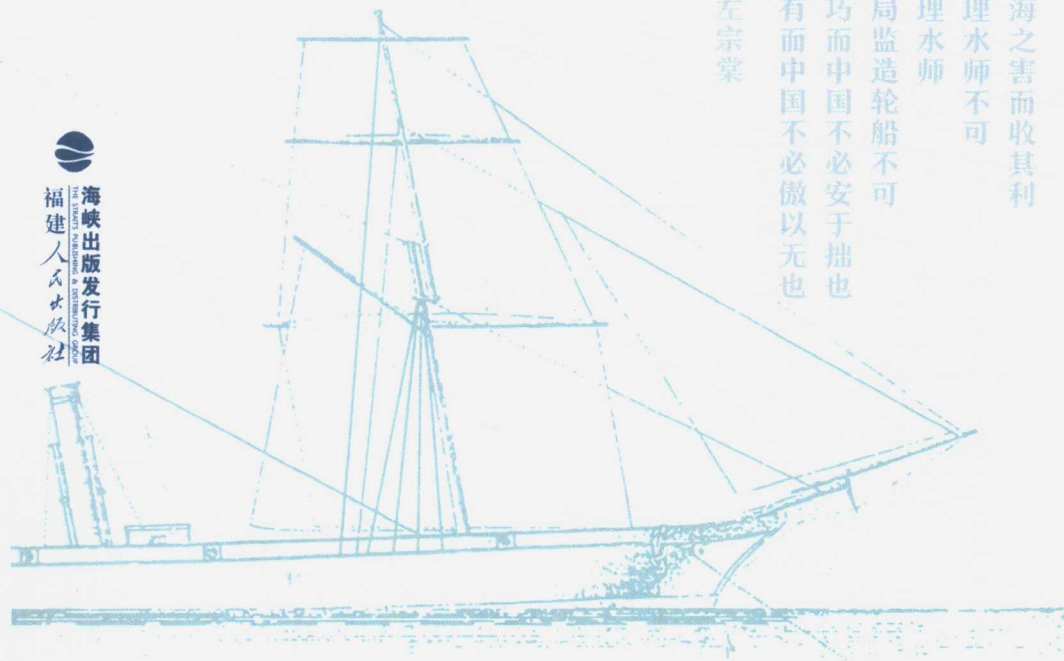
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

泰西有而中国不必傲以无也

左宗棠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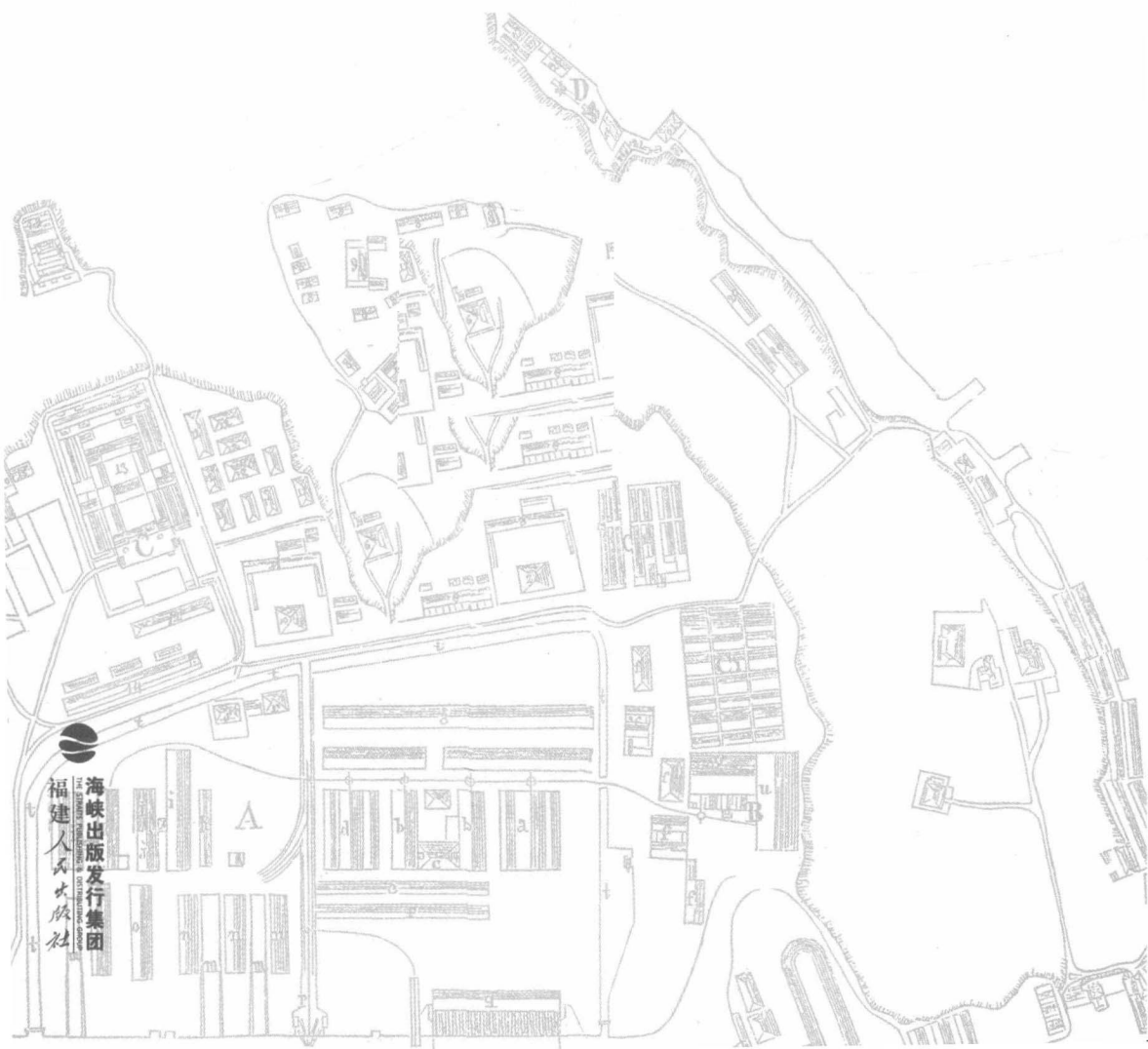


船政史



Chuan Zheng Shi

陈悦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自 序/001

第一编 船政的创设/001

第一章 海疆失防的年代/001

第二章 奠基东南/029

第三章 创设/074

第二编 总理船政大臣与五年计划时代/111

第四章 厂区、人员、机构/111

第五章 五年计划时代的舰船建造/149

第六章 五年计划时代的船政教育/179

第七章 五年计划时代的船政水师/202

第八章 五年计划时代的内、外风波/232

第九章 船政成功/265

第三编 督办船政大臣时代/291

第十章 沈葆楨离任/291

第十一章 淮系影响下的历任督办大臣/323

第十二章 督办大臣时代的船政自身建设与经费状况/344

第十三章 督办大臣时代的新舰船/363

第十四章 督办大臣时代的船政教育/392

第十五章 马江之战和船政水师的陨落/428

第四编 署理船政大臣时代/458

第十六章 张、裴交替/458

第十七章 裴荫森时代的舰船制造/471

第十八章 裴荫森时期的船政自身建设与教育发展/490

第五编 兼管、兼充船政大臣时代/514

第十九章 兼管、兼充船政大臣时代的历任大臣/514

第二十章 兼管、兼充船政大臣时代的船政自身建设及教育/535

第二十一章 最后的外国技术团/552

第二十二章 末期的舰船建造/573

第六编 后船政时代/590

第二十三章 民国北京政府时代的船政转型/590

第二十四章 民国南京政府时代的船政演变/631

第二十五章 抗战烽火与船政衍脉/655

结语：回望船政/676

附录 1：船政总览图/686

附录 2：船政教育机构历届毕业生名录/689

附录 3：船政造舰艇性能参数一览表/708

附录 4：船政造舰艇线图/714

附录 5：飞机制造工程处所造飞机参数一览/734

附录 6：飞机制造工程处所造部分飞机线图/736

主要参考书目/741

第三编 督办船政大臣时代

第十章 沈葆楨离任

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
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①

一、1874 年日军侵台及沈葆楨巡台

社寮，是位于台湾岛南端的一个山区村落，现属于台湾屏东县境内，1874 年 5 月 22 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成为了历史的焦点。当天，社寮外海蒸汽舰船群集，在日本军舰“东”（排水量 1358 吨，铁甲 Corvette）、“龙骧”（排水量 2571 吨，铁甲 Corvette）、“孟春”（排水量 357 吨，Gunboat）、“日进”（排水量 1468 吨，Sloop）等护卫下，包括雇佣的英国、法国商船各一艘在内的日本运兵船队从长崎抵达这里，日本“台湾番地事务都督”西乡从道中将率领 1300 余名日军（主力为日本熊本镇台步兵第 19 大队）悍然踏上了中国台湾的土地，开始对当地部落（番社）攻杀洗掠。明治维新后，意图学习西方列强通过暴力征服落后民族、国家而野蛮崛起的日本，借 1871 年中国属国琉球的船民在台湾南部被当地人杀害一事，借口为琉球遇害船民复仇，挑起了侵犯中国主权的侵台事件。^②

① 沈葆楨题台南延平郡王郑成功祠楹联，沈丹昆编：《沈葆楨手迹》，福建省音像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4 页。

② 〔日〕安冈昭男：《明治前期日清交涉史研究》，（日本）岩南堂书店 1995 年版，第 100—107 页。



日本美术作品：1874年日本军队侵入台湾的情景。

还在日军尚未大举出动之前，1874年5月14日总理衙门综合从各处得到的情报，已经预感到日军可能会有进犯台湾的举动，向清廷建议委派“闻望素著，熟悉洋情”的大员以训练操演的名义，率领船政水师军舰前往台湾观察局势，预作防备。^①清廷随即谕令船政大臣沈葆楨肩起这一千钧重任，“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②。尚未及行，5月29日总理衙门获悉了日军已经登陆台湾的消息，眼见事态迅速恶化，遂又申请清廷授予沈葆楨就近处理台案的专权，任命沈葆楨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同时明确授权沈葆楨可以节制调度福建驻军以及申请调动江苏、广东等沿海地区的蒸汽动力军舰。^③

船政五年计划刚刚期满，后续的发展方略尚未完全议论定局，因为突遇日本侵台事件，船政大臣沈葆楨被迫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巡台问题上。1874年6月3日，沈葆楨就台防等事的处置部署方略向清廷拜发

① 《奕訢等奏日本兵船现泊厦门请派员查看折》，《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十），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736页。

②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十），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736页。

③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十），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746—3747页。

多封奏折。对于台防的战略，沈葆楨拟定为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等三大端，择要而言就是设法通过购买铁甲舰、水雷等新式舰船、武备加强海防；申请调用前署台湾兵备道黎兆棠等随同渡台处置事务；申请设法铺设连接福建和台湾的电报线，以使两岸建立起高效便捷的通讯联络。^①

就自己赴台之后的船政工作，沈葆楨则举荐在闽丁忧守制的原陕西布政使林寿图担任船政稽查，负责坐镇船政，并组织、部署船政地域乃至闽江的防务工作，以确保船政以及省城福州的安全。同时沈葆楨还向清廷提出了申请，建议万一遇到防务事有不测的情况，即授林寿图以专折上奏权，事实上将林寿图作为船政大臣的临时护理、候补人选。此外，明显是考虑到林寿图对船政的具体工程建设等工作不熟悉，沈葆楨举贤不避亲，推荐由自己的妹婿、内阁中书銜莆田县学训导吴仲翔出任船政提调（吴仲翔，字维允，是沈葆楨的四妹婿。另外，沈葆楨的第五子娶吴仲翔的女儿为妻，因而沈葆楨与吴仲翔还是亲上加亲的亲家关系），专门主管船政的生产等事项。因当时日本海军铁甲舰“龙骧”已经在福建沿海出没，甚至一度驶入过闽江，为了防备日军侵台事件波及福建，充实船政所在地域的防务力量，沈葆楨在行前还命令驻防船政一带的福靖军后营统领王正道另添募一营新兵，番号定为福靖军新后营。（由此原福靖军后营又称为老后营）^②

就赴台本身的工作，沈葆楨举荐了当时尚在上海的原船政洋员总督日意格随自己同行，并举荐船政总监工叶文澜在闽兼顾办理为台湾防务采办军火事宜。^③

对沈葆楨的这些安排，清廷一一认可。^④ 沈葆楨随后于 1874 年 6

① 《遵旨会筹大概情形折》，《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2—83 页。

② 《派稽查并提调片》，《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4 页。有关沈葆楨与吴仲翔的私人关系情况参考了沈丹昆编：《沈葆楨手迹》，福建省音像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6 页。

③ 《叶道办军火并挈日监督东行片》，《船政文化研究——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4 页。

④ 《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十），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3760 页。

月14日率众从马尾出发，以船政水师的“安澜”号炮舰为旗舰，同行的福建布政使潘霨则乘坐“伏波”号炮舰，日意格以及原船政洋员监督帮办斯恭塞格乘坐“飞云”号炮舰。由马尾出发之后，潘霨乘坐“伏波”首先直驶台湾，沈葆楨则率“安澜”“飞云”编队先逐一巡视福建沿海港口以及澎湖的防御形势，而后于6月17日才抵达台湾府城的安平海口（今属台湾台南市）上岸。^①

抵台伊始，摆在沈葆楨面前的是极为棘手的局面。

与现代中国人所理解的台湾一词有所不同的是，当时台湾的含义既可指台湾全岛，又可特指行政区划上的福建省台湾府。1874年时的台湾府，下辖台湾（今台南市南部）、凤山、嘉义（原名诸罗）三个县以及澎湖厅、淡水厅、噶玛兰厅等单位，^②其最主要的行政管辖区域集中在台湾岛的西南侧和北侧沿海一带（与台湾岛邻近的澎湖岛当时隶属台湾府的台湾县辖下，设澎湖厅，台湾中北部设淡水厅管辖，台湾东北部设噶玛兰厅）。当时台湾岛上的府、县、厅，地域狭小，建设落后，以全台的枢要中心台湾府城为例，沈葆楨到达时看到的是这样一番面貌：“城市湫隘，臭不可近。民居、官舍皆低矮不及内地之半。其民俾昼作夜，日荒于嬉”。^③在台湾府县厅的治所以外，有大量土著村社杂处其中的山区，当时处在道路不通和行政、教化未及的不开化的蛮荒状态，即所谓的番社地界、化外之地。

其时，台湾岛的番社少数民族民风彪悍，仍然盛行着猎头出草等古老的嗜血野蛮习俗，



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事件期间日方拍摄的台湾少数民族照片。

① 《文煜等奏沈葆楨到台日期并倭兵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十），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773—3774页。

② 夏献纶：《全台舆图》，光绪六年福建台湾道藏版，第4页。

③ 沈吕宁、沈丹昆编著：《沈葆楨家书考》，福建省音像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页。

也由此经常发生进入番界的外来者被当地人猎杀的事件，“其俗，得一头颅，方能得妇；处事不论情理，以得级之多寡为曲直。故时挟标枪，伏莽狙击；中则割其首，吮血刮肉而去。兵勇、樵夫被其刺者，不时而有”。^① 清政府在台湾的地方官员每每遇到这类发生于治所外的暴力事件，多表示无力处理。虽然以清廷的传统观点，台湾全岛自古就在中华版图之内，无论已经施行行政统治的区域或是行政未及的番界，都是毋庸置疑的中华国土，不过按照当时的西方国际法理论，处在清政府台湾府县厅治所之外的番界地区（且台湾地方官曾在对外交涉中提及无法处理番社地区事务），很容易被解读为主权性质暧昧的灰色地带。而 1874 年日本正是以台湾岛番界的性质模糊不清的把柄而借机兴兵入台。

日本的侵台举动一方面有对台湾岛番界乃至全台的垂涎、吞并之意，同时还有借此而颠覆清政府和琉球国之间传统宗藩关系的阴险用意。就在沈葆楨渡台之前，日军已经于 6 月 1 日从社寮登陆点分兵三路攻入番界（左翼军从风岗口进攻、中央军从石门口进攻、右翼军从竹社口进攻），与猎杀琉球船民事件直接相关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台湾风俗图》中的《土番杀人耀武图》，表现的是台湾少数民族的出草猎人头后在番社内游行夸耀的习俗。

的牡丹社在 6 月 3 日被攻陷，其他有牵连的高士佛、加芝来等番社也遭日军焚毁。^② 此后日军开始在台湾南部的番界地区营建营房建筑，驻扎

① 罗大春：《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台湾银行 1972 年版，第 21 页。

② 《文煜等奏沈葆楨到台日期并倭兵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十），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3774 页。〔日〕安冈昭男：《明治前期日清交涉史研究》，（日本）岩南堂书店 1995 年版，第 106—107 页。

军队，不断威逼利诱招降周围的其他番社，大有想把台湾南部的番界地方全部纳入囊中的架势。

此时台湾的情势错综复杂，从台湾岛隶在大清版图的角度看，日本此举已属对中国侵略开战，不过日本政府工于算计，其侵台军事行动初期主要是在台湾府县厅的治所之外进行，基本没有直接侵入台湾府县厅的行政所及地区，也没有和台湾地区的清政府军队发生战斗，据此也可认为事实上并没有和清政府发生军事冲突。在这种日军没有直接和清政府交手的情况下，清廷持力保和局的思想，本着息事宁人的应对态度，没有决心采取军事行动进行反击，而是寄希望于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事端。^①

抵台后，经过对台湾实际情况的了解，结合清廷在处置此事上的指导性态度，沈葆楨提出了处理台湾事件的三项基本措施：理喻、设防、开禁。^② 其中开禁即改土归流，将番社完全置于台湾地方政府的行政区划隶属里，从而杜绝外国借口干涉台湾岛番界事务的口实。^③ 理喻主要指外交谈判，即和日军进行理论，让日方知晓和承认台湾全岛都属中国领土，从而劝退日军，此点虽然沈葆楨派日意格等在台湾尝试和日方接触、辩论，但实际主要依靠总理衙门和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等在北京进行高层的外交交涉。布防则是布置台湾岛的防务，不仅包括加强台湾府行政所及区域的防务，也包括前往番界地区设防，以及配套的修建通往番界的道路实施“开山”，进行招抚、教化番社等“抚番”工作，以军备和行政并举的方式，巩固和扩大清政府在台湾岛上的实际控制区，防备侵入台湾岛的日军势力扩散蔓延，以事实进一步说明台湾岛全岛均属中国版图。三项措施相比较，布防无疑是理喻、开禁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条件，属于迫在眉睫的事务，也是沈葆楨在巡台初期的主要工作。

以当时沈葆楨手握的力量看，其最得力的倚仗便是官员、幕僚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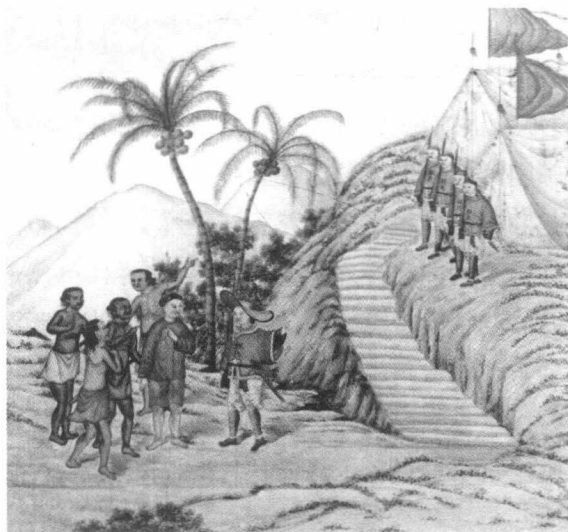
① 清廷的处置态度参见《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十），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763页。

② 《文煜等奏沈葆楨到台日期并倭兵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十），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774页。

③ 《致罗景山军门》，《沈文肃公牍》，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和蒸汽动力舰船队伍。

台湾的最高地方军政首长为福建分巡台湾兵备道，沈葆楨渡台时担任该职务的是原船政提调委员夏献纶，是曾经和沈葆楨有长期默契合作的官员，故交重逢共事，配合自然会非常顺畅默契。此外，在沈葆楨周围参赞军政事务的人群中，也有大量和船政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员，诸如洋员日意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台湾风俗图》中的《卑南生番归化图》，表现了1874年台湾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在台湾的开山抚番场景。

格、斯恭塞格等都曾在船政长期服务，至于在沈氏麾下更多具体办理技术性和事务性工作的委员、学生，更是多来自于船政。由此，几乎可以说，沈葆楨是以一支原船政的官员、工程人员班底来处理调度台防事务，显然能收如臂使指之效。

沈葆楨巡台时手握的另外一支重要力量是军事力量，即船政水师。1874年日军侵台事发后，闽台海防顿时吃紧，分防各省的船政水师军舰遂被召返回马尾，参与执行巡台等任务，由船政水师的蒸汽动力军舰在台湾和大陆之间，乃至福建和大陆沿海各省之间建立起了一条十分重要的海上交通线。此时布防、往来于海峡两岸的船政水师，舰船的数量完全凌驾于日本侵台舰船之上，这不仅可以掌握住对台湾海峡乃至台湾岛沿海的控制权，使得海上的运输万无一失，对侵台日军形成巨大压力，同时有一支颇具规模和实力的近代化舰船部队参与巡台，还有助于调度官员、兵力快速前往台湾岛上陆地交通难及的南北沿海各地，迅速实施布防，也有助于建立起台湾与大陆之间的高效通信联系。唯一不足的是，当时日本侵台军舰的序列中存在有名为“龙骧”和“东”号的两艘小型铁甲舰，其无论是防护力和火力都在船政水师的各舰之上，此事

显然对沈葆楨刺激颇深，也因此日后沈葆楨的海防思想中形成了无铁甲舰无以自强的观点。

虽然有了得力的办事官员以及海上兵力，以台湾的布防而论，沈葆楨当时手中还欠缺一支重要的力量，即陆上的军队。在台湾岛上，无论是和侵台日军抗衡相持，还是择要布防、开辟通往番界的道路，都需要大量得力的陆上军队。台湾岛在清代虽然原有绿营的水、陆师部队驻扎，归福建台湾镇总兵节制，但是驻防地区分散，装备劣，战斗力低，而且清代台湾绿营长期采取从大陆派兵轮流驻扎的班兵制度，并不招募台湾本岛人民入营，造成绿营班兵视台防为畏途，不仅长期严重缺额，且士气十分低落，凭借这样的军队根本难以指望在台湾实现震慑日军以及开山抚番等目标，而且对于当时沈葆楨谋划中的前往台湾北部进行预防性布防的目标，更是根本无力企及。^①

为此，沈葆楨一面奏请清廷改变台防绿营采用班兵的传统制度，同时设法在台湾本岛以及福建、广东等地招募兵勇、壮丁编组成团勇部队和民夫队伍，充实台湾陆上战力和工程施工力量。沈葆楨巡台时期，在台湾本地的绿营兵之外，先后招募编成了镇海营、绥远旗、绥靖军、飞虎军等番号的勇营部队。^② 另外，沈葆楨还奏调兼任船政水师统领的绿营福建水陆师提督罗大春回归陆师提督本任，由罗大春率领福建的勇营军队渡台增援，其部主要为原驻防在省城福州附近的福靖前营等原楚军系统的福靖军部队以及日本侵台事发后在福建新募的福锐军等部队。^③ 这些军队从人数上充实了台防的陆上军事力量，但是其明显的缺陷是装备差、训练差，还无法对侵台的日军形成真正的威慑。从根本上增强了台防陆军实力的，则是北洋大臣李鸿章调拨入台的唐定奎部淮军精锐部队。

① 有关台湾绿营兵的没落情况参见许雪姬：《清代台湾的绿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7 年版，第 77—95 页。

② 台湾事变时驻防台湾北部的清军镇海营原由兵备道夏献纶统辖，该营番号和船政的驻厂护卫部队镇海营相同，是否为同一支待考。有关台湾绥远旗军队的编成情况，参见罗大春：《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台湾银行 1972 年版，第 14—15 页。

③ 罗大春：《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台湾银行 1972 年版，第 14—15 页。

二、沈、李交谊与淮军赴台

北洋大臣李鸿章和船政事务原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交集，不过李鸿章与船政大臣沈葆楨是道光丁未科（1847年）的同榜进士，存在同年之谊，二人科举出仕后曾一度在翰林院有过同学、同僚的关系。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李鸿章、沈葆楨二人又先后进入了湘军大帅曾国藩的幕下，因在军政事务上表现出色，为曾国藩所器重，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员。在曾国藩总督两江时，李鸿章、沈葆楨就分任其属下的江苏、江西巡抚，存在有合作之谊（同时期在两江总督治下的浙江，巡抚为左宗棠）。沈葆楨就任船政大臣后，李鸿章虽然因故对船政一度抱有消极的态度，但并无证据显示沈、李二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嫌隙，反而因宋晋奏停船政风波乃至船政轮船设法商租等事，相互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和密切，二人在洋务、海防等事务上所持的观点也日益接近。就在得知沈葆楨受命渡海巡台后，李鸿章做出了十分积极的反应，随之成为沈葆楨在处理日本侵台事件中的重要后援之一。



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
李鸿章与沈葆楨有着同年、同僚等关系，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二人围绕中国的海防建设问题交流日多，观点相近，互相引为知己，随后在中国海防上出现了李鸿章、沈葆楨分领北洋、南洋海防建设的局面。

就在沈葆楨行将赴台时，李鸿章于1874年6月2日向沈葆楨致送了一份长函，逐细分析日本侵台事件原委，并为沈葆楨点明了有关应对处理之策的建议，其中着重提醒沈葆楨应注意加强台防陆上军队的力量：“彼既兴师登岸，其办法亦不外‘论以情理’、‘示以兵威’二语。上元日来示谓，人只知御戎之要在水，不知至要仍在陆，最为中肯。粤东、江苏各轮船似均未经大敌，只可巡查游奕，虚张声势，运载军需仍赖陆军枪炮得劲。如事不可已，应求良将劲兵以为助。日本人多用后门枪，华兵尚不知有此物，敝处虽有之，亦尚未及多

操，良以为憾。再，台地民气可用，康、乾中历经助义杀贼，今岂无人。大纛一呼万应，略除重敛暴征，鼓舞以作其气，彼见不得逞志，或渐思撤退耳。”^①

6月10日，李鸿章的这封书信由船政水师的“济安”号军舰送达台湾，李鸿章设身处地的分析、建议令沈葆楨大受感动。在书写回信时，沈葆楨除与李鸿章交流处置日本侵台事件的措施方略外，还直接就李鸿章来信中有关加强台防陆军的建议提出请求，希望李鸿章能够派拨淮军劲旅来台，并希望李鸿章能以军火援应台湾：“捧诵十八日教言，所以诱掖之者，无微不至，推公忠爱国之念，下及故人，感何似矣……日意格谓新练之洋枪队，急切难用，惟台轍有惯战之洋枪队二万余，如能调一万南来，则陆路可无虑矣。渠又请于津营拨法兰西小铜炮五十尊（即四磅炮），每尊三百子，并炮手管弁前来。沪局自制里明东弹子，津局火药，并请咨拨……”^②

沈葆楨此信中有关请调淮军来台的提议，实际完全超出了他当时的权限。清廷赋予他的军力调动权力只是可以调动驻防福建的陆军以及征调福建、江苏、广东的近代化舰船，并没有调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辖下淮军的权力。足以令人称奇的是，沈葆楨的这份求援信还在邮路上，尚未递送到李鸿章的手中时，李鸿章竟然如同未卜先知般，已经在一份新写的给沈葆楨的信中，主动提出为加强台湾的陆军力量，可以调派淮军中的精锐——铭字武毅军十三营步队前往台湾供沈葆楨驱使，同时还表态将由金陵机器局制造一批火箭和发射架运赴台湾，^③与沈葆楨的请求简直不谋而合。“窃念执事单骑赴台，若事机稍有齟齬，徒恃数只轮船，岂能徒手吓贼……日意格前亦面称，须多调洋枪队。海内习洋枪者，金以敝部淮军最早而多，近年分防各省，固形散漫，而规制犹存，各营皆用英法兵枪、来福枪两种。弟虽略购后膛枪，因无大敌，未

① 《复沈幼丹节帅》，《李鸿章全集》第三十一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

② 《致李少荃中堂二》，《沈文肃公牍》，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③ 此处所说的火箭指欧式的“康格里夫”火箭（Congreve Rockets），这种火箭需要通过专门的发射架进行发射，是19世纪中叶重要的火力压制兵器。

肯给发，犹之尊论，操演宜用前膛，临敌莫便于后膛也。台事如可片言却敌，自勿庸议，否则拟为筹调若干。查现驻徐州之记名提督唐定奎，朴干能战，所部有铭军武毅马步十六营，均系枪队，从刘省三历剿粤、捻，号称劲旅。雨亭同年虽倚为保障，似可移缓就急，酌调唐提督统带步队十三营，由徐移至瓜洲，派轮船径驶该口，分批航海前去……再折内拟购各种利器，水雷、后膛枪愧无多助，火龙、火箭敝处金陵机器局久能仿制，近用英式铁架施放，无须高架木尾，甚为灵捷。顷飭段道喆赶备十二磅、二十四磅火龙二千枝，并铁架若干具，解交吴桐云处，专船或附便轮送船政局查收转拨。津局洋火药略有存储，如有急需，并可酌数咨调。”^①

当李鸿章寄出这份信件后不久，沈葆楨之前那封询问李鸿章能否调动一万名淮军以及法兰西小铜炮和新式步枪子弹援台的复信才到了李鸿章手中。看到沈葆楨提出的具体要求，李鸿章又写了一封回信，针对沈葆楨来信中的新要求，做了积极的回应：“敝军本拟渐次裁遣，以节饷需，闻台湾消息乃中止，除津郡万余留卫畿辅，陕防万人相距较远，惟唐俊侯定奎驻防徐州闲地，尚算大枝枪队，虽不敢云惯战，尚可略助声援。倭退则此军似敷布置台防，否则续调刘子务廉访盛藻驻陕铭军枪炮队十九营以为后劲。刘、唐皆省三军门得力大将，转战南北，素称劲旅。或唐营不足，再由子务处分调数营以益之，以符一万之数，亦无不合……又法国小铜炮系宁局仿制，敝军步队多用之，津局现存二十尊，即可拨解；宁局存者尚多，尽可陆续应调……沪局自制林明敦弹子（即来示所云里明东也），闻甫设厂开制，秋后乃有成数。尊购林明敦枪，其弹系中针抑旁针，须俟弹子到时，发一式样，寄令照造……津局火药实较外洋粗药尤精，尊需十万斤以内亦可酌付……”^②

李鸿章这一先一后发出的两封信件都是首先送抵福州，再在7月7日和11日先后交给船政水师的“琛航”“万年清”军舰领取后送往台

① 《致沈幼丹节帅》，《李鸿章全集》第三十一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② 《复沈幼丹节帅》，《李鸿章全集》第三十一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

湾，但因为遭遇台风阻隔，原本先后出海的二舰实际上在7月13日一起抵达了台湾，李鸿章的两封书信便在同一天来到沈葆楨的案头上。沈葆楨同时读到李鸿章写于不同时间的信件，发现在自己向其商量请援之前，李鸿章其实已经主动表态可以派淮军来台，沈葆楨为李鸿章对自己的全力支持所感动，回信中用了极为动情的措辞：“捧读之余，大喜过望，时雨之师，于今见之……蒙赐铜炮、火龙、火药，贫儿暴富，陆路可恃无恐……”^①

在和李鸿章事实上已经商定好了调兵遣将的细节之后，沈葆楨于7月21日正式上奏申请清廷饬南北洋大臣调得力军队赴台湾协防，^②上谕准奏，责成李鸿章等就此迅速筹办。私下里早已和沈葆楨达成默契的李鸿章旋即在25日向清廷复奏，称自己已经根据上谕的指示做好了安排，决定调派唐定奎部武毅军赴台。沈葆楨、李鸿章二人通过互相配合的上奏、复奏，启动官面的行政程序，使私下早已拟妥的派兵计划成为朝廷的决策。一俟朝廷批准李鸿章奏请的上谕下发后，在徐州宿迁一带早就“束装已待”的唐定奎部十三营精壮淮军便开始启程前往台湾了。^③

在尚无朝廷命令的情况下，身处南北、相隔遥远且互不统属的两位高级官员仅仅凭着私人的交谊和一致的政见，竟在私下达成了一次规模庞大的增兵台湾抗衡日军的计划。而后二人再分别以官场上的正式身份，依循正式的程序，来使他们箭在弦上的计划获得国家批准。这宗以私交而影响到国家决策的例子，标志着沈葆楨、李鸿章二人私交的升级，也足以证明二人当时在政见上的融洽程度。可以设想，倘若当时沈、李之间不存在多少私交关系，那么1874年处理日军侵台事件时，

① 《致李少荃中堂五》，《沈文肃公牍》，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2页。

② 《文煜等奏赴台理谕倭将抚谕各番并布置水路防务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十），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759页。

③ 清廷于李鸿章上奏当天颁发上谕准奏，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四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181页。唐定奎部淮军启程的日期为1874年8月2日，见《复沈幼丹节帅》，《李鸿章全集》第三十一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0页。

清军陆军大举入台可能就不会如此顺畅，钦差大臣沈葆楨其后在指挥属于外来军队的淮军时，可能也不会调度自如。1874 年处理侵台事件中的实践，是沈、李二人联手在中国近代海防事业上发挥影响力的真正开始，二人的这种合作默契也即将对之后的船政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海防大筹议

唐定奎部淮系武毅军十三营步队在 1874 年 9 月分批从驻地徐州出发南下，首先抵达长江边的古渡瓜州，再由轮船招商局派出的商船“伊敦”“利运”“永清”分批装载渡台。^① 因为时值台风季节，当时台湾又没有设施完善的可供大型船只停泊的避风港口，倘若大型商船直接运兵到台，在港口停泊、转驳小船登陆期间遭遇风暴，必将遭遇不测。考虑及此，遂改为招商局轮船先将军队运抵澎湖，再分批用小轮船转驳入台，进入避风内港登陆。首批援台淮军于 1874 年 9 月 22 日抵达澎湖，经船政水师派出的“长胜”“靖海”等小型军舰从澎湖转驳至台湾后登陆上岸，再向台湾南部的凤山地区集结，以形成对距此不远的侵台日军的抗衡和压迫之势。^② 继之，余下的各批武毅军陆续也在 10 月末之前到齐台湾。经中方在台湾大兵压境相抗衡，再加以在北京的外交谈判，中日两国于 10 月 30 日就台湾事件的和平解决达成了一致协议，^③ 侵台日军最后于 1874 年 12 月撤离台湾，^④ 日本侵台事件在当年得以解决。

日本侵台事件在清政府所造成的强烈刺激，较之第一、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入侵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此前欧洲列强所施加给中国的侵略欺凌，还能委屈隐忍的话，长久以来为中国所瞧不起的东瀛小国日本在近代化初有成就的情况下竟然敢剑指中国，则被清政府内外视为

① 《唐廷枢、徐润致盛宣怀函》，《轮船招商局》，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9—20 页。

② 《沈葆楨等又奏装运淮军轮船到台并日船一艘至琅峤片》，《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十），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3880 页。

③ 《奕訢等奏与日使议定退兵恤银折》，《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十），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3947 页。

④ 〔日〕安冈昭男：《明治前期日清交涉史研究》，（日本）岩南堂书店 1995 年版，第 114 页。